

融合、迁移与反思： 博物馆教育研究的多元脉络与学科想象

Integration, Transfer and Reflection:
The Multi-context and Subject Imagination of Museum Education Research

宋 娴

Song Xian

(上海科技馆, 上海, 200127)

(Shanghai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useum, Shanghai, 200127)

内容提要：博物馆“教育”的兴起与转型都脱胎于具体的社会情境中，是多元制度和具体实践的产物。中国在接受西方博物馆学科体系时，一同舶来了其教育遗产，但是相关学术传统所依托的社会历史情境不复存在，将面对的社会进程与文化需求也截然不同。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研究主体和经验对象的不断丰富，中国的博物馆教育热度逐步上升，研究从单一的博物馆学视角，逐渐加入了教育学等更多学科视角。但在教育的“共识”背后，依然存在许多断裂之处。本文旨在理解中国博物馆教育研究在地域迁移和学科融合中如何发展，它的研究“真空”在哪里，并尝试探讨未来研究的可能方向。

关键词：博物馆教育 博物馆学习 学科融合 博物馆教育研究史

Abstract: The rise and transformation of museum education were born in the concrete social situation, is the product of multiple institutions and concrete practice. Since China accepted the western museum discipline system, educational heritage was imported yet the social and historical context on which the relevant academic tradition was based on no longer existed, besides the social process and cultural needs in this circumstance were completely different. Form the 1980s, with the continuous enrichment of research subjects and experience objects, Chinese museum education has shown a gradual upward trend, and the research field has gradually added more 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such as pedagogy from a single perspective of museology. But behind the “consensus” of education, there are still many cracks.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understand how Chinese museum education research develops in the context of regional migration and disciplinary integration, where the research “vacuum” is, and to explore possible direc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

Key Words: Museum education; museum learning; discipline integration; history of museum educational research

“一代有一代的问题和方法”。尽管博物馆“以教育为目的”似乎已经是具备悠久传统的共识，但共识背后其实是复杂历史和社会情境的产物^[1]。从全球范围来看，19—20世纪，博物馆教育概念有过本质的转变^[2]，其精英主义色彩在历史的进程中被逐步削弱，同时博物馆教育研究的学术传统整体经历了从“教育”到“学习”的转变。博物馆教育研究是如何逐步转变的？移植到迥异于西方的社会土壤中，中国的博物馆教育研究又呈现出哪些新特点？本文将对博物馆教育研究在学术传统上的融合与迁移进行重新梳理，并解读它如何影响当下的博物馆学科建设。

一、“教育”作为目的：博物馆教育研究的多重起源

（一）共识背后：博物馆教育研究起源的多元线索

1. 博物馆教育的起源

首要问题是博物馆“教育”为何？关于博物馆教育的具体起源说法不一，有些研究以博物馆观念的变化为起点，有些以教育部门的诞生为起点，有些以讲解员这一职业的出现为起点。不论以何种具体现象为标志，一般认为早期博物馆教育的兴起与公众应该接触到藏品的信念有关^[3]，博物馆教育学者伊丽莎白·杜克洛斯-奥赛罗（Elizabeth Duclos-Orsello）将这种博物馆教育所具备的变革力量归纳为“共享的权威（shared authority）”^[3]。

在博物馆诞生的欧洲，早期的博物馆教育与民族国家的崛起基本同步，与权力展示、精英培育与社会控制密切相关，这其中又以法国大革命时期围绕卢浮宫性质的公共辩论最为著名。学者李万万认为，类似于是否将卢浮宫改造成一个“中央化博物馆”的社会大讨论，实质上标志了一种“试图影响全社会的自由主义教育的乌托邦”的新秩序的诞生^[1]。可以说公共博物馆的出现凸显了博物馆公共教育功能，二者互为表里；但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公众”依然具有极强的精英主义取向，主要面向能够有闲暇来参观的专家、学者、学生等，换言之当时的博物馆教育主要服务于贵族阶层。

2. 博物馆教育研究的起源

更具现代性的博物馆教育思想则兴起于美国^①。在博物馆现代化运动后，博物馆才真正成为现代意义上的社会教育机构。1895年，史密森学会助理秘书长乔治·布朗·古德（George Brown Goode）发表了一篇重要文章《博物馆的关系与责任》，厘清了当时尚不清晰的博物馆定义，认为博物馆应当具备五大使命“促进学习、保存与记录、补充课堂、传递特定信息、展示大众文化”，把促进公众教育视为博物馆的核心功能。同时古德主张博物馆是现代城市不可或缺的重要教育机构，“任何一个国家、城市或省份的文明程度，都可以从其公共博物馆的特征和对它们的慷慨资助中得到展现”^[4]。博物馆教育功能的凸显和问题化为博物馆教育研究带来了成长的土壤，而美国博物馆教育研究后来的兴盛，则更多来自教育学领域对博物馆实践的冲击。在20世纪60年代前后，美国教育界的进步教育运动宣告失败，但约翰·杜威（John Dewey）、约翰·科顿·达纳（John Cotton Dana）等一批学者的实用主义哲学、机能主义心理学和经验自然主义教育学等理论启发了博物馆，让博物馆教育的焦点从知识转向经验和体验，为博物馆教育研究确立了实用主义的基本取向^[5]。

同期，美国博物馆协会提出博物馆“以教育为目的”，提出“开放式学校”等使命，但此时教育学的研究传统依然深深影响了其实践，即将博物馆环境视作一种特殊的教育中介变量，认为学习总是需要在可控的中介环境中开展^[6]，对博物馆教

① 比如美国马萨诸塞州莱斯利大学乔治·E·海因（George E. Hein）教授在其重要论著《进步主义博物馆教育》（*Progressive Museum Education*）中主张，欧洲错杂的权力网络和博物馆藏品的贵族属性决定了他们无法完全展现出现代公共教育的平权理念，真正符合当时进步主义思潮的博物馆教育只有在美国这样新建立的国家中才能实现。

育的研究也偏重分析教学技术^[7]。总的来说,早期欧洲和美国的博物馆教育思想尽管起源的社会语境各有不同,但都基于同一种“理性的基石”——即实在主义的教育立场,其前提是知识已经存在宇宙中,人们的目标就是要努力去理解它^[8]。

(二) 走向“博物馆学习”的研究方向

20世纪70年代后,新博物馆运动的兴起,对正式教育和博物馆传统角色都构成诸多挑战。总体来说,博物馆从以馆藏为基础,转向以观念、经验、诉求为基础^[9],人们对“学习”的理解发生了认知论层面的改变。也是在这一时期,博物馆确立了如今以学习者为本位的“博物馆学习”基本研究取向。

在与教育学融合的基础上,博物馆教育研究开始与心理学、社会学等更多学科以及文化研究、女性主义、生态学等后现代理论发生更多碰撞,背后实际是整个学术界关于知识论认识的变迁,即走向非还原论。以心理学家杰罗姆·布鲁纳(Jerome Seymour Bruner)为代表的结构主义思潮兴起^[10],教育研究中关于“人”“社会”“主体性”“心智”“本土”“结构”等基本范畴和前提被挑战,出现记忆转向、叙事转向、关系转向、女性主义转向、情感转向、空间转向等问题^[11-12]。

博物馆教育脉络本身也继续演变。从强调个体学习逐渐走向社会文化理论等视角,主张学习是在不同角色、阶层、时间和诸多情境之间进行协调发展

的状态,代表学者比如约翰·福克(John Falk),林恩·迪尔金(Lynn Dierking),乔治·E.海因,张恩静(EunJung Chang)等,他们主张探索更加灵活、整体的教学实践方式^[5]。博物馆被重新建构成教育生态系统的有机部分,引入实践共同体^[13]、行动者网络^[14]、社区连结^[15]等新思想资源。

可以看到,尽管社会对博物馆教育呈现出一种持续的热情,但其中不同时期对“教育”理解实则并不一致。背后是博物馆教育核心范式处在多元学科不断融合和再建构的动态过程中,其关注的问题领域也在不断改变。

二、中国博物馆教育研究的迁移与融合

(一) “民众教化”: 早期中国博物馆的教育传统

相较于西方的博物馆教育,中国博物馆教育自舶来之时就已经嵌入在现代博物馆体系中,从晚清民国博物馆初创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体制建设,一直面向社会及经济文化变革的需要,教育目标明确且凸显。

我国最早引进与兴办的博物馆与美国早期效仿欧洲而兴建的博物馆类似,希望利用博物馆搜求器物、启发民智、提高国民的文化教育水平,具备初步的社会教育思想^[16]。1905年张謇开办的南通博物苑,就与南通师范学校的教学密切相关,其推崇“观古今之变迁,验文明之进退”,主张建立新时代的道德。此后民国时期,也是将博物馆作为“民众教化,兴学术研究”的机构运作^[17]。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确立了博物馆三重基本性质:“科学研究机关,文化教育机关,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遗存或自然标本的主要收藏场所。”博物馆教育体系再度重建。

与博物馆实践的缓慢发展相比,关于中国博物馆本体的研究迟迟未启动。一来因为吸纳和重建“知识”本身的问题更加急迫,二是因为在20世纪中国曲折的现代化进程中,博物馆学科的建设本身存在着断裂与反复,直到1980年南开大学^①和1984年复旦大学率先筹建博物馆学专业,才逐步启动博物馆专业教育。而博物馆相关的研究基本等同于关于博物馆物的收藏与陈列研究,多因循考古与历史学的学术传统^[19],博物馆教育这一研究方向很长时间内未能从博物馆研究中独立出来^[18],学界对中国博物馆教育研究的思想脉络亦关注甚少。

① 南开大学博物馆学专业的初创可以追溯到1959年至1961年,于历史系短暂开设过博物馆学专门组。直到改革开放后,1979年南开大学历史系率先重新筹建博物馆学,并于1980年初向教育部提出申请,2月底获得教育部正式批复,同意新设博物馆学专业。

（二）20世纪80年代以来博物馆体系中教育研究的发展

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不少学者将博物馆的历史作为现代学术传统和思想史的材料本身加以检讨,尤其是21世纪以来博物馆学语境下的教育史才逐渐得到学者关注。其中,徐坚对民国时期民众教育对当时博物馆的影响做了系统梳理^[20];史勇从民国时期知识界视域出发,对博物馆社会教育功能进行具体分析^[21];李飞则进一步厘清了教育博物馆的概念^[22];侯晓慧对严智怡的博物馆科普教育思想进行讨论^[23]。

2007年国际博协修改博物馆的定义,将教育作为博物馆第一功能,博物馆教育研究也更加引人关注其实在此之前,已有宋向光等学者围绕博物馆定义开展探讨,为博物馆的教育功能重新定位,呼吁补上相关学科版图^[24]。严建强则引入传播学视角,转向博物馆学习中的观众认知特征及传播研究^[25]。此外,还有陈卫平等学者引入建构主义的视角重新理解博物馆教育^[26]。

但与西方不同的是,教育学等其他学科对博物馆实践的兴趣一度并不浓厚。后来从事博物馆教育研究的学者,多半来自博物馆领域,多从教育的功能定位和制度设计层面开展争鸣,而在教育技术、教育理论等方面少有更为学理化的深入思考。直到更多教育学背景的学者进入博物馆领域实践,学科融合的趋势才逐渐产生。从此处也可以看到,与西方博物馆教育发展不同,中国博物馆教育的研究并非从本土博物馆实践中自然生长而来,更多是博物馆学科自身建制化的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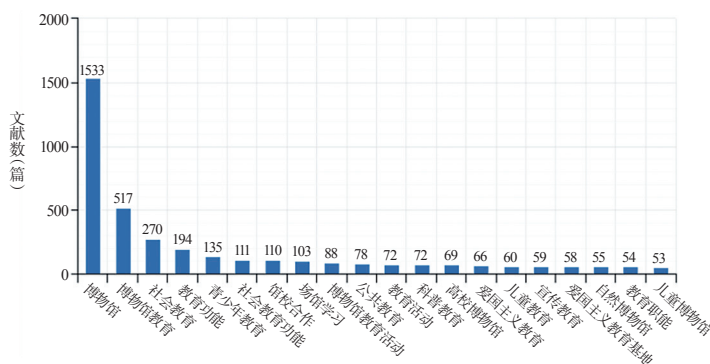


图1 近四十年来中国博物馆教育相关研究的主要主题分布情况

物。换言之,实然经验与博物馆教育的学理化过程之间存在着意义的真空,呈现出学术与经验、议题与情境剥离的现象^[27]。

从相关文献统计看,以“博物馆教育”、“博物馆学习”或“场馆学习”为合并主题词,对中国知网(CNKI)学术期刊数据库中1985年以来的文献进行检索,可得到5321篇相关中文研究,其中期刊及学位论文共计3413篇。从发表趋势来看,博物馆教育研究整体呈现出逐年上升的趋势,主要主题分布在对博物馆教育功能、青少年教育、馆校合作、场馆学习等方面的讨论(图1)。从学科背景来看,过半的研究者都来自博物馆学专业,对应的期刊来源也主要为文博相关的学术期刊。教育学领域有相关讨论,数量较少也并不充分,更多为就职于自然科学类博物馆、具有教育学专业背景的跨界研究者^①。

按被引量从高到低对检索文献进行排序,选取前200篇高引文献,又回溯其中引用的经典文献,并对其中涉及的理论取向、经验对象、核心问题进行了归纳整理,虽然此处无法一一穷举,但是对相关趋势已可窥一二(表1)。其中大多研究回应的问题和前提依然是西方提出的博物馆教育议题,而并非完全由自身实践生长而来。同时也能看到,近十年来,随着越来越多的学科进入博物馆教育这一领域,跨学科的博物馆教育研究也在不断出现,学理化的程度逐渐加深。

（三）近十年来我国的“博物馆学习”研究

从上文不难看出,近十年来,我国的博物馆教育研究领域迎来了真正的热潮,伴随着博物馆教育实践的丰富,相关研究也从前期对教育功能和类型学的讨论,走向对博物馆学习、符号诠释、互动传播、教育合作以及效果评估等中观层面的理论探

① 以上统计结果及柱状图(图1)由中国知网直接生成。

索。教育学、传播学、社会学等越来越多学科关注博物馆学习这一场域，关于博物馆教育的研究开始真正进入热潮，并出现许多高引文献。

这一时期的研究也逐渐出现新的特征。首先是非正式学习框架已经成为博物馆教育研究的显性概念。从早期作为正式教育补充的“校外教育”走向更为独立的“博物馆学习”，博物馆教育研

究中更加突出以场馆为核心的学习环境，并强化自身在教育学上的专业属性。与之一并崛起的，是对场馆中对话^[28]和自由身体^[29]的关注（后者往往在传统课堂中被极大约束），并将感官体验与运动作为重要变量纳入学习模型中，也有学者由此出发探讨具身性与博物馆认知与传播的问题^[30]。在这一点上，博物馆学习研究甚至可以酝酿出超越传统教育学研究的潜能。

其次是近年来馆校合作实践的繁荣，也激发了对博物馆教育作为教育网络有机部分的研究探索。早期的馆校合作研究，更多关注博物馆如何融入正式教育框架。但随着博物馆主体性

表1 近四十年中国博物馆教育研究基本取向分析

时期	代表性研究示例	作者背景	理论取向	经验对象	核心问题
20世纪末	宋向光《博物馆教育是贯穿博物馆一切工作的基本主题》（《中国博物馆》）	文博	博物馆学	博物馆定义	国际博物馆的博物馆定义与教育功能
	莫利·哈里森，严建强《如何开展博物馆教育》（《中国博物馆》）	文博	博物馆学	博物馆展览	博物馆展陈的教育功能开发
21世纪前10年	曹宏《中国当代博物馆教育体系刍议》（《中原文物》）	文博	博物馆学	博物馆教育体系	博物馆教育类型和体系构建
	陆建松《关于我国博物馆学研究及其学科建设的思考》（《东南文化》）	文博	博物馆学	博物馆学科	博物馆学科建设
	段勇《美国博物馆的公共教育与公共服务》（《中国博物馆》）	文博	博物馆学	美国博物馆教育	中美博物馆教育对比
	史吉祥《博物馆观众研究是博物馆教育研究的基本点——对博物馆观众定义的新探讨》（《东南文化》）	文博	博物馆学	博物馆观众研究	博物馆观众的定义
近10年来	大卫·安德森，季娇《从 STEM 教育到 STEAM 教育——大卫·安德森与季娇关于博物馆教育的对话》（《华东师范大学学报》）	教育学	教育学	博物馆教育理论	博物馆教育理念变化
	郑奕《博物馆教育活动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	文博	博物馆学、教育学	博物馆观众研究	博物馆教育活动的规划与实施
	周婧景《博物馆儿童教育研究——儿童展览与教育项目的视角》（浙江大学出版社）	文博	博物馆学、教育学	博物馆儿童展览	博物馆儿童教育
	宋娴《中国博物馆与学校的合作机制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	教育学	教育学、管理学	馆校合作	馆校合作的机制模型
	翟俊卿，毛玮洁，梁文倩，等《亲子在参观自然博物馆过程中的对话研究》（《现代教育技术》）	教育学	教育学	博物馆参观中的亲子对话	博物馆中的非正式学习机制
	郑旭东，李洁《经验，教育与博物馆：走近杜威的博物馆教育思想》（《现代远程教育研究》）	教育学	教育学	杜威教育思想	博物馆教育理论发展

的提升,加上行动者网络等理论为当前的教育提供了一种“去中心化”的思考,博物馆这个传统正式教育网络之外的异质行动者,其价值正在进一步凸显,尤其是在教育数字化的进程中,博物馆与教育的连接空间和连接机制还有待进一步的探索。其中比如季娇、翟俊卿等学者对馆校合作共同体的发展进程开展了重新梳理与反思^[31],为理解博物馆在教育实践中如何发展互动性社会关系提出了重要的理论视角。

此外,还有不少学者开始关注博物馆教育者的专业实践^[32]、博物馆学习的通用成果评估^[29]等话题,这些研究反过来又推动了博物馆教育的专业化发展。

三、超越学科:博物馆教育研究的未来可能

正如博物馆学者艾琳·胡珀-格林希尔(Eileen Hooper-Greenhill)提出:“对博物馆身份创造性的再构想是后博物馆时代的一大特征。”^[33]博物馆教育研究的多学科融合和问题重塑,也是博物馆领域不断发展其创新性和流动性,以回应其与社会关系的一个重要折射。

尽管博物馆教育实践已有悠远历史,但是由于缺乏可供反思的理论框架和记录自身发展资料的习惯,对博物馆教育的文献梳理往往难度很大,因此博物馆界教育实践的持续和理论探讨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真空^[34]。但在追溯学术传统时,不难发现博物馆教育研究具有社会文化的敏感性。博物馆的教育思想总是与当下社会情境、结构密切相关,看起来抽象的思想资源,实则脱胎于具体社会情境中对具体问题的回答。

在中国,博物馆“教育”的属性更强,转向“学习”的社会基础更弱。究其原因,是西方博物馆教育研究中关心的知识建构与背后的权力问题在中国曲折的现代化过程中被更加急切的问题所遮蔽,博物馆教育长久以来缺乏向非还原论转型的动力和社会基础。

另一方面,在学科接合中,博物馆教育呈现出比较明显的拿来主义特征。学科的初步融合虽然为博物馆教育研究带来了繁荣,但可以看到,这种融合并不彻底,当前整体研究依然依附于教育学的基本视角,没有和博物馆学所关注的问题情境彻底融合,并未激发两个学科间真正的理论对话,从长期来看可能会限制相关研究的进一步发展,这也是世界范围内的博物馆教育研究的挑战。

挑战也是机遇。博物馆教育研究无疑是个充满潜能的议题,如果未来能够超越学科之见,打破将博物馆教育学视为博物馆学或者教育学分支学科的习惯性定位,重新检视相关基本范畴和前提,同时更加关注中国博物馆教育的自身实践,回到本土真实的问题情境中,以更加开放的问题域(如教育生态、学习空间、交互情境等)来回应博物馆教育本身的多重脉络、多元属性,亦能挖掘出博物馆教育研究发展的更多可能。

参考文献

- [1] 李万万. 博物馆的历史: 从欧洲原型到本土化发展的中国博物馆[M]. 北京: 人民美术出版社, 2019: 4.
- [2] PROTAS N. Where does the history of museum education begin[J]. Journal of Museum Education, 2019(4): 337-341.
- [3] DUCLOS-ORSELLO E. Shared authority: The key to museum education as social change[J]. Journal of Museum Education, 2013(2): 121-128.
- [4] GOODE G B. The relationships and responsibilities of museums[J]. Science, 1895(34): 197-209.
- [5] 周婧景, 马梦媛. 博物馆教育理论及其发展初探: 内涵、发展和未来[J]. 博物院, 2021(4): 39-45.
- [6] BARNARD W A, LOOMIS R J, CROSS H A. Assessment of visual recall and recognition learning in a museum environment[J]. Bulletin of the Psychonomic Society, 1980(16): 311-313.
- [7] WENGER E. Communities of practice: Learning, meaning, and identity[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215.

- [8] 郑旭东. 培育反思性实践者: 博物馆教育工作者专业发展的现实与未来[J]. 现代教育技术, 2015(7): 5-11.
- [9] ROBERTS L C. From knowledge to narrative: Educators and the changing museum[M].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1997: 147.
- [10] 郑旭东. 从博物馆教育到场馆学习的演进: 历史与逻辑[J]. 现代教育技术, 2015(2): 5-11.
- [11] 叶蓉桦. 社会变迁中的博物馆教育功能反思[J]. 博物馆学季刊, 2004(1): 55-62.
- [12] RASMUSSEN B, WINTERROWD S. Professionalizing practice: A examination of recent history in museum education[J]. Journal of Museum Education, 2012(2): 7-11.
- [13] 季娇, 伍新春, 青紫馨. 非正式学习: 学习科学研究的生长点[J].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1): 74-82.
- [14] 左璜, 黄甫全. 行动者网络理论: 教育研究的新视界[J]. 教育发展研究, 2012(4): 15-19.
- [15] 刘襄仪. 社群时代的博物馆教育展望[J]. 博物馆学季刊, 2008(2): 97-123.
- [16] 王增华. 博物馆社会教育宣传与服务工作探析[J]. 文物鉴定与鉴赏, 2019(4): 122-123.
- [17] 马宗荣. 社会教育事业十讲[M].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36: 185-186.
- [18] 徐玲. 中国近代博物馆学研究综述[J]. 中国博物馆, 2007(2): 77-84.
- [19] 张文立. 博物馆史研究: 近三十年来中国的进展[J]. 中国博物馆, 2008(3): 100-104.
- [20] 徐坚. 名山: 作为思想史的早期中国博物馆史[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6: 189.
- [21] 史勇. 民国知识界视域中的博物馆社会教育功能(下)[J]. 中国博物馆, 2018(4): 38-41.
- [22] 李飞. 社会、学校与家庭: 民国人对博物馆教育功能的引介和实践[J]. 东南文化, 2014(1): 116-121.
- [23] 侯晓慧. 严智怡的博物馆科普教育思想与实践——从1919年天津博物院的“观鲸会”谈起[J]. 博物院, 2018(3): 27-34.
- [24] 宋向光. 博物馆定义与当代博物馆的发展[J]. 中国博物馆, 2003(4): 1-6.
- [25] 严建强. 在博物馆里学习: 博物馆观众认知特征及传播策略初探[J]. 东南文化, 2017(4): 93-101+127-128.
- [26] 陈卫平. 建构主义与博物馆教育[J]. 中国博物馆, 2003(2): 23-28.
- [27] 尹凯. 博物馆教育的反思——诞生、发展、演变及前景[J]. 中国博物馆, 2015(2): 1-11.
- [28] 翟俊卿, 毛玮洁, 梁文倩, 张鸿澜. 亲子在参观自然博物馆过程中的对话研究[J]. 现代教育技术, 2015(11): 5-11.
- [29] 艾琳·胡珀-格林希尔. 博物馆与教育: 目的、方法与成效[M]. 蒋臻颖, 译. 上海: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2017: 39-55.
- [30] 王思怡. 多感官博物馆学: 具身与博物馆现象的认知与传播[D]. 杭州: 浙江大学, 2019.
- [31] 季娇, 翟俊卿, 王秀江. 矛盾、边界和文化工具: 西方国家馆校合作共同体的建构与发展[J]. 比较教育学报, 2021(1): 112-126.
- [32] 宋娴, 罗蹊. 博物馆教育者的专业素质: 特征与框架[J]. 全球教育展望, 2019(6): 119-128.
- [33] HOOPER-GREENHILL E. Museums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visual culture[M]. London: Routledge, 2020.
- [34] CURRAN E. Discovering the history of museum education[J]. Journal of Museum Education, 1995(2): 5-6.